

为了将来会更好

□ 王 玮(82级化工系、中文系)



“将来的社会会更好吗？”

爱人在垂危的时候，曾经轻轻地问我，也像在问自己。

这里是她曾经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奋斗、认真生活的人世间；这里留下了她42年短暂人生的平实足迹。在她溘然长逝后，这里还有她深恩未报的父母、相濡以沫的爱人和尚未成年的稚子。她怎能放下眷恋，怎能不对未来牵肠挂肚？

如果时光倒流18年，她对未来不会有一丝疑问。那群举着小旗子、抱着募捐箱在前门地区穿街过巷的清华女生，都有一个简单的信念：这个国家和社会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和我的爱人张晓玲分别于1982和1984年考入清华化工系和自动化系，后来都转到中文系读双学位。1982年满怀激情和梦想跨进清华，正是国家由乱而治之时。这一年考入清华的同学，无论年龄还是文化知识都已相当整齐，与参差不齐的77、78级擦肩而过；这一级同学的政治课本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基本国策”，都是背得烂熟的送分题。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想的年代，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那时，清华园里有许多非常活跃的学生社团或圈子，聚起一群群活跃分子，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清华文学社

可能是其中最具规模的社团之一。1984~1985年间，我担任清华文学社社长，组织举办了“四月诗会”，聚集了清华最有文采的才子佳人。在大礼堂前的草坪上，一群校园诗人冒着细雨，激情朗诵自己的诗作；许多同学驻足倾听，由衷地为他们鼓掌……相信这一幕在许多同学心里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印象。那时，文学社编印的《清华文学》很受同学欢迎，经常看到许多同学在食堂门前买这份油印的刊物，有些学生用的是饭票。那时，徐葆耕教授主讲的《西方文学思潮》，是清华园里最受欢迎的人文选修课程。

在学生社团或圈子里，经常能遇到一些“异人”。我曾经和一个叫陶海心的师兄讨论政治权力的边界。陶兄问我在读什么书，告诉我一定要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就无法找到理解中国当代政治与社会的钥匙。

那时常被辅导员叫去谈话，被提醒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时化工系管我们年级的是一个姓瞿的老师，我记不得

他的姓名，但是记得他的热情、宽厚和亲切。他说，邓丽君不是自由化，也不算靡靡之音。这个态度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但是，你有更好的选择，”他说，“比如贝多芬，《英雄》或者《命运》，伟大的交响曲！”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我交出了邓丽君的磁带，得到了贝多芬的作品。

八十年代掐头去尾我在清华校园待了六年，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清华对我的影响，那就是理想、责任和承担。那时的理想远大而空泛，却又非常实在地期望效力一个伟大的国家。这种情结影响了我在毕业后选择做事的方向和价值观。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家财经杂志担任主编，却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采访参与三峡工程决策和论争的许多当事人，并在《梦断长江》一书中试图厘清这个超大工程决策过程中各种力量 and 价值观的交锋；随后，我参与国家汽车产业政策调研时，写了《汽车神话》一书，关注广泛汽车交通这种工业化后果如何深刻地改变国家和社会。恩师徐葆耕教授在为《汽车神话》写的序言中说，“他没有像学者们那样过多地关注学术问题的细节，或像政府官员那样乏味地阐释具体政策。作者把笔墨直落问题的核心，即以汽车社会为样本，分析探讨重大科技决策和产业选择对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人文和社会生态的深刻影响，研究和传播社会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的科技理性。”

八十年代充满政治热情而躁动不已的校园逐渐浮现出商业社会的喧嚣和琐碎。几年后我到清华讲